

修辞困境的三大矛盾及其突破路径

杨 彬

摘 要:表情达意的修辞行为是人类重要的基本行为,实质是将内在的意念情思进行言语化处理,其间存在重重困境。欲突破困境进而适情适境地实现修辞创造,需要重新深入探究导致修辞困境的主要矛盾。意念的多维性与能指的线条性之间的矛盾、能指的线条性与句段的非线性之间的矛盾、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性与认知经验的个体性之间的矛盾,可谓是导致修辞困境的三大主要矛盾,对此亟须深化认识,这是进一步系统探索修辞行为规律并突破修辞困境的必要前提。创新并发展研究范式、扭住语言本位并致力于通晓语言文字的一切表达可能性,可谓是推动修辞学创新发展、指导修辞主体突破困境顺畅地实现修辞创造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修辞困境;三大矛盾;范式;路径;修辞创新

作者简介:杨 彬,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083)

一、问题的提出:修辞困境

(一)《视刀环歌》所示的修辞困境

在建构话语、交流信息以顺畅实现人际互动的过程中,言说者往往容易深陷于难以突破的修辞困境,或难以阐明言说过程与其规律。比如:

(1)常恨言语浅,不及人意深。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刘禹锡《视刀环歌》)

“言语浅”而“人意深”,形象化地体现出言与意之间存在巨大的甚至完全无法弥合的鸿沟;而脉脉“两相视”却可传达“万重心”,则又强有力地反向证明语言表达往往苍白无力,难以切实有效地传情达意。

(2)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吾不能知也。^[1]

苏轼《文说》所言“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的修辞状态,可谓是让无数后来者无比羡慕的神乎其技、从心所欲的自由境界;但是,更让后来者痛感心有戚戚的恐怕是其痛切的感喟——其他吾不能知也!

高尔吉亚认为,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修辞与其他艺术不同,其间差异在于:其他艺术提供关于制作器具以及从事其他看得见摸得着的各种人类活动的知识,而修辞则通过看不见摸不着的言辞进行其所有活动并产生一切效果^[2]。对此种“不可见、难识解”的现象,刘亚猛基于对西方修辞思想的梳理(特别是对伽达默尔阐释哲学思想的分析)指出:“由于言说在一个根本意义上与人类自身及其生存密切关联,也由于它跟人类的基本社会实践以及(与‘理论理性’相对立的)人类‘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之间存在着难解难分的关系,我们无法将它彻底客体化(objectification),或者说无法完全将它当作一个外在的事物进行客观观察,因而也就无法对它进行充分的理论抽象。”^[2]

尽管如此,由于修辞具有无比神奇的魔力^[2],由于“修辞拥有某种征服一切的影响力,能够使所有被这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语体甄别的汉语语篇研究”(2018BY012);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规划项目“基于语体的对外汉语语篇研究”(20171140031)

一影响力触及的事物‘心甘情愿而不是迫于无奈地臣服’”^[2]，因而，古往今来无数言说者往往都甘做修辞创造的“囚徒”，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坚定与“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执著，致力于修辞创造，以求“精乎艺而臻于道”的境界。

综上，本文暂拟将修辞困境的内涵界定如下：

修辞困境，是指在将内在的情思意志进行言语化处理以实现人际信息交互传达的修辞创造过程中，由于言与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由于可资用于修辞创造的语言要素及其应用规则的限定性和面向人际交流的认知表达需求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的种种矛盾，由于修辞创造活动本身无法彻底客体化而不能将之作为外在之物进行客观考察与理论抽象的根本局限，修辞创造主体不得不遭受的重重困境。这是修辞创造主体深受修辞所具有的神奇魔力的蛊惑心甘情愿努力突破却又不可能真正彻底化解的困境。

尽管修辞困境无法真正彻底化解，但是为了实现更加顺畅的人际交流，我们不得不努力探究修辞之“艺”，否则，结果会如孔子所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3]在《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中，苏东坡明确阐发“艺”的重要价值：“（龙眠）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1]东坡认为，龙眠居士李伯时之所以能画出山庄的妙处，关键在于他未把注意力凝滞于某一具体事物之上，而是努力使“神与万物交”“智与百工通”，因而能对山庄中的一切景象了然于胸；而且，还在于他富有绘画所需的各种“技艺”。

然而，如何才能达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修辞妙境，苏东坡却未能提出明确的方案，并未提出修辞创造之“艺”的具体法则。原因或许正如陈望道所言，“文法贵乎守经，而修辞侧重权宜”^[4]。修辞创造，贵在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因情因地创新，似乎注定不应有固定而严整的规律可循，但是无论何种变化，均须遵循其不变或渐变之“宗”^[5]，否则，我们无从认知事物与事相。

就本质而言，修辞是以语言要素及其应用规则为根基的科学和艺术，所以本文拟借助理论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与逻辑学的相关成果探析导致修辞困境的主要矛盾，继而在借鉴近年来汉语修辞学重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具体语言现象，初步探索可以有助于化解修辞困境的路径。

二、导致修辞困境的三大主要矛盾

对于修辞的困境及其成因，齐梁时代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修辞学家刘勰作过一番形象而精妙的阐述。在其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中，刘勰说：“夫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6]这段妙论的大意是：言说主体在进行修辞创造的构思阶段，无数的意念会竞相萌发，一起涌上心头；万途竞萌、纷繁复杂的意念情思，处于混沌状态，一时难以应用各种规则使之明晰化，难以精雕细刻地加以塑造定形。在提笔书写之前，内在旺盛奔突的气势远远超越文辞本身；然而，等到话语建构工作完成之后，又会痛感大打折扣，会认为连所思所想的一半都不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这种情况，可谓极其普遍的现象，几乎所有经历写作体验的人，都会遭遇这种修辞困境。

尽可能全面而深入地阐明造成上述修辞困境的主导因素，是突破修辞创造困境、探究修辞规律的必要前提。基于理论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逻辑学的相关成果，导致修辞困境的主要矛盾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尽管这三大矛盾是语言表达的基本矛盾，人类表达只能宿命般地在这三个不可能彻底解决的根本性矛盾之中进行，但是，从矛盾论的角度看，“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7]，矛盾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因素，普遍而绝对地存在于所有事物的全部发展过程之中；相对系统而深入地认识事物内部的矛盾，无疑有助于更加有效地适度化解矛盾，推动事物更好地发展。现将导致修辞困境的三大主要矛盾试析如下：

（一）意念的多维性与能指的线条性之间的矛盾

神思方运阶段那种“万途竞萌”的勃郁状态，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的困顿之间，无疑存在着巨大矛盾。对此，刘勰的表述无疑是高度形象化的，对这种表述的理解程度的高低，依赖于理解者想象力、言说经验等因素的强弱多寡，往往因人而异，带有鲜明的主观性，不易交流沟通，因而，有必要用相对客观的言说

方式重新分析。

从现代语言学的视角来看,刘勰提出的这种矛盾,可谓“意念的多维性”与“能指的线条性”之间的矛盾。所谓“意念的多维性”,是指意念的多维错综的属性,或许正是因为意念的这种属性,在思维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地在广袤无限的时空之中自由地进行思维的跃迁;这种自由奔冲、跃迁的思维,形成极为模糊而复杂的网络。索绪尔说:“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5]“星云”堪称是意念多维性网络状态的绝妙喻体。

要分析“能指的线条性”,则须先说明“能指”。“能指”是现代语言学鼻祖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经典概念,在语言学范畴之内,它指的是与某个概念具有稳定关联的音响形象。在言说的过程中,能指形象只能一个一个地连接起来,而绝不可能同时发出两个以上的音响形象。索绪尔认为:“能指属听觉性质,只在时间上展开,而且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a)它体现为一个长度,(b)这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定:它是一条线……它跟视觉的能指(航海信号等等)相反:视觉的能指可以在几个向度上同时并发,而听觉的能指却只有时间上的一条线;它的要素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我们只要用文字把它们表示出来,用书写符号的空间线条代替时间上的前后相继,这个特征就马上可以看到。”^[5]正因为能指具有借自时间的两大特征,所以,作为能指的音响形象,只能在时间线性一维的向度展开,而绝不可能像航海信号那样,可以同时朝多个不同的向度展开,这种只在时间向度展开的一维性就是“能指的线条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意念是模糊无定的,但音响形象并不比它更为固定,音响形象也不是情思意念必须与之严整地配合的模型,而只是一种可以按需塑形的物质,它本身又可以被切分为更小的部分或者往往存在多种变体,从而为情思意念提供更为精细的可资负载的能指形式。在韵律层面,很容易找到这方面的证明。比如,熊子瑜、林茂灿基于对“啊”的研究指出,在自然会话中,“啊”的韵律表现具有巨大而鲜明的差异,语流中“啊”的韵律表现与其交际功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话语的韵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交际功能制约,他们按其交际功能,将“啊”区分为叹词、助词和话语标记词三种类型^[8]。此前赵元任早就认为,“啊”可以分为助词和叹词两种情况,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助词“啊”与叹词“啊”都没有固定的声调,但助词是轻声,而叹词非轻声,且具有各种模式的语调;(2)助词是粘着的,在语音上需要附着于前一个音节,在语法上需附着于前边的短语或句子,而叹词是自由的^[9]。赵元任还指出:助词跟叹词间还具有跨类的情形,在“早点儿回来啊!”中,“啊”是助词,而在“早点儿回来,啊!”中,“啊”是叹词。在书面语中,由于使用了可以标示语句边界的形式标记(即标点符号),作为助词和叹词的“啊”,很容易区分开来;但在自然语流中,由于没有这类直观的显性形式标记,致使口语中的叹词“啊”和助词“啊”有时很难区分。

修辞创造首先要遭遇意念情思的多维性和能指的线条性的巨大矛盾,修辞创造的过程,是言说主体在修辞意图的支配下将多维复杂的意念情思压制到能指的线性链条的过程,这个过程艰难得近乎神秘,关键在于:在此过程中,言说主体需要尽可能明晰地将浑沌复杂的意念情思和并不更为固定明晰的音响形象关联起来,并力求实现某种近乎精妙的确定性。对此,索绪尔有一番妙论:“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浑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明确起来。因此,这里既没有思想的物质化,也没有声音的精神化,而是指的这一颇为神秘的事实,即‘思想-声音’就隐含着区分,语言是在这两个无定形的浑然之物间形成时制定它的单位的。我们设想空气和水面发生接触:如果大气的压力发生变化,水的表面就会分解成一系列的小区分,即波浪;这些波浪起伏将会使人想起思想和声音物质的结合。”^[5]索绪尔所说的大气的压力,与言说主体尽可能全面而精妙地实现修辞意图的内驱力,具有本质的相似性,可视为两个异质同构的认知域相互参照理解。

(二)能指的线条性与句段的非线性之间的矛盾

由于语言符号的能指关乎听觉,具有借自时间的线性一维特征,只在时间上展开,所以,在话语中,各个词语彼此联缀在一起,彼此结成以语言的线条性为基础的关系,词语这种语言要素一个挨着一个地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索绪尔把这种“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称为句段

(syntagmes),并明确指出:一个要素在句段中只是由于它跟前一个或后一个,或前后两个要素相对立才取得它的价值。”^[5]比如:

(3)一棵草 一根针

在上面两个“句段”中,“棵”不能直接和“草”联缀,“根”也不能直接和“针”联缀而形成合格的句段;除非在对举等特殊的条件下(如“一草一木、一针一线”),一般来说,“一”既不能直接和“草”联缀,也不能直接和“针”联缀,因为它们和后面的要素不能形成对立从而取得价值^[10]。索绪尔说:“我们不是通过孤立的符号说话的,而是通过符号的组合,通过本身就是符号的有组织的集合体说话的。在语言里,一切都归属于差别,但是也归属于集合。”^[5]

这个论断启示我们对于“能指的线条性”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陈保亚将这种情况称为“符号的线条性”;我们则将之称作“句段的非线性”,一是因为像“一棵草、一根针”这种联缀组合已经进入话语建构层面,二是因为这种联缀组合而形成的“句段”已经蕴含了层次关系,即在言说的过程中,需要先组成句段“[一棵]”“[一根]”,然后再分别和“[草]”“[针]”组合,形成更大的句段“[一棵][草]”“[一根][针]”。实质上,“[一]”首先只是在线性一维的向度上与“[棵]”相联缀,继而作为一个整体再与“[草]”相联缀,但是“[一]”“[棵]”这二者都和“[草]”处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一根针”的情况与此相同,不再赘述)。这种情况说明,能指的线条性往往会掩盖句段内在的非线性,这是能指的线条性和句段的非线性矛盾相对表层的体现;二者的矛盾还具有深层次的表现。下面对此进行探析。

陈保亚认为:如果我们注意观察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可以看出替换实际上也是生成新的组合的手段。以汉语为例:

(4)喝牛奶 拿果汁;喝可乐 拿饮料

儿童能够很容易从上面的组合中替换出句法单位或语符,生成下面新的组合:

(5)喝果汁 拿牛奶;喝饮料 拿可乐^[10]

在话语生成的过程中,儿童从所接收到的组合中替换出句法单位或语符并生成新组合的行为,恐怕更应说是其话语理解和言语创造能力实现巨大突破与飞越的明证。在此过程中,儿童成功地完成从“喝牛奶、喝可乐”到“喝饮料”的替换或初始连接,可以说儿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将“牛奶、可乐”进行范畴化的抽象概括;然而,能够成功地生成“拿牛奶、拿可乐、拿果汁、拿饮料”等非线性的句段,则可谓实现了更具创造性的飞越。从表面来看,从“喝牛奶、拿果汁”到“喝果汁、拿牛奶”,不过是两个简单的动作动词的直接替换,或者不过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初始连接;但如果深入到语义层面来看,则可发现“喝牛奶、喝果汁”与“拿牛奶、拿果汁”具有显著的差异。

借用语义分析的术语可以说,具有[+液体]这个语义特征的“牛奶、果汁”,与作为身体器官的“嘴”所发出的动作“喝”,可以直接实现语义对接或匹配性融合,“喝牛奶、喝果汁”所表征的,是嘴巴对牛奶等发出的吸食、吞咽等动作行为;可是,从逻辑上看,具有[+液体]这个语义特征的“牛奶、果汁”,并不能和同样作为身体器官的“手”直接组配,认知经验告诉我们:手是不可能直接拿取‘牛奶’或‘果汁’等液态物质的,必须借助某种器皿。如果再借助认知语言学中“事件框架与注意力视窗开启”的观点来分析,则可以说“拿牛奶”是一个事件序列被精制压缩并被特别聚焦凸显的结果^[11]。“拿牛奶”可以分解为“拿杯子、走过去、打开冰箱、拿出牛奶瓶(或盒)、打开牛奶瓶(或盒)、倒牛奶、端过来”等一系列子事件,而“喝牛奶”则可以处理为一个不必再作解析的小事件,除非出于特别的修辞需要,一般情况下,完全不必将之进一步分解为“张开嘴、咬含、吮吸、吞咽”等子事件。

从本质上看,“喝牛奶”与“拿牛奶”的差异,颇能体现能指的线条性和句段的非线性之间的矛盾。“拿牛奶”在句法形式上之所以与“喝牛奶”相同,是因为在言说过程中,言说主体进行信息筛选、剔除并截搭组配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大脑中潜在的语言系统或者至少是相关的联想关系(又称“聚合关系”)集合被激活,从而供言说主体选择调用。索绪尔说:“我们的记忆常保存着各种类型的句段,有的复杂些,有的不很复杂,不管是什么种类或长度如何,使用时就让各种联想集合参加进来,以便决定我们的选择……观念唤起的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整个潜在的系统,有了这个系统,人们才能获得构成符号所必需的对立。符号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这一原则可以适应句段,也可以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句子,不管它们多么复杂……”

在这个(选择和确定的)过程中,说话者心里把不能在指定的点上显示所需差别的要素全部排除出去,联想集合和句段类型都起着作用。”^[5]在日常话语交际中,对于“拿牛奶”所激活的事件框架的表述,由于注意力视窗开启情况的差异,不同的言说主体完全有可能选用“倒牛奶、端牛奶、拿牛奶”等不同句法形式来表征同样的行为或事件。

上述差异是能指的线条性和句段的非线性之间的矛盾深层次体现,这是因为:“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这些配合)不是以长度为支柱的;它们的所在地是在人们的脑子里。它们是属于每个人的语言内部宝藏的一部分。我们管它们叫联想关系。句段关系是在现场的;它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相反,联想关系却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5]索绪尔的这个论断,可谓是对能指的线条性与句段的非线性本质差异的精辟阐发。

(三) 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性与认知经验的个体性之间的矛盾

世界上存在数千种不同的语言,而且语言之间存在诸多明显的差异。索绪尔认为这是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明证,而语言符号之所以具有这种本质属性,关键在于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约定俗成的。他说:“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5]在索绪尔看来,只有完全任意的符号才能比其他符号更好地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才更适于形成最复杂、最广泛也最富有特点的表达系统。对于有的人用“象征”来指语言符号,索绪尔指出:象征并不是完全任意的,因为象征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一点自然的基础,比如作为法律象征的“天平”就不能随使用其他什么东西代替^[5]。

约定俗成性与任意性本质相同,可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个概念;然而,任意性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说的,语言符号一旦在语言集体中得以确立,就同时具备了强制性,语言集体中的个人不能随意打破这种约定俗成的联系。这正如索绪尔所说:“任意性这个词……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5]比如,作为音响形象的代表的“苹果”或“apple”等,和其所指(即那种蔷薇科苹果属植物所结的可供食用的果实)之间,并无任何可以论证的理据性联系,它们都可以表征颜色、形状、口感、硬度、品种等等属性、特征各不相同的“苹果”。

从逻辑的角度看,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联被约定俗成地确定下来的过程,即是形成并确定概念的过程。概念是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态,概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依据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的研究可以说:在认知事物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感觉—知觉—印象—初级概念—深刻概念”的发展历程。人们应用感知器官认识当前事物的时候,便能够认识到事物某方面的属性,比如眼睛看到某种颜色、鼻子嗅到某种气味,这便会形成对于事物的某种感觉,关于同一事物的某种同一性感觉经过多次叠加,并与有关该事物的多种感觉不断汇聚,大脑便会发现不同属性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形成关于当前事物的完整的知觉形象。由于记忆的作用,大脑会将反复经历的感觉与知觉加工成较为稳定的印象。金岳霖认为,印象是大脑把多次感觉知觉所认识到的形象进行不同程度地综合的结果,“在感觉、知觉与印象的基础上,借助于语言的抽象作用”^[12],人们便形成了反映事物的概念。由于我们多次应用同一个语词去表示同一类中的许多个别事物,就使我们能从这些个别事物中抽象出这类事物的特有属性……概念的产生,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的质变。概念和感觉、知觉、印象有质的区别。感觉、知觉与印象,都是反映事物的具体形象的;在这些具体的形象中,事物的特有属性与偶有属性是混然不分的。但是概念却不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概念只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而不反映事物的偶有属性,所以概念具有抽象性,而不像感觉、知觉与印象那样具有直观的个别性。因此可以认为,对于语言使用者集团而言,语言符号的所指是删汰了事物偶有属性(甚至是派生的特有属性)而只保留决定性的特有属性的深刻概念^[12]。但是,对于语言集团中的个体成员来说,语言符号的所指,则无法和个体独特的感觉、知觉与印象等形象化信息割裂开来;语言符号的能指,在语言集团个体成员脑海中激活的绝对不止于“深刻的概念”,很可能首先会激活个体性认知经验。“‘望/听’梅止渴”的现象,可谓是个体经验会对语言符号认知理解产生深刻影响的明证。

陈望道认为：“语言文字的声音、形体、意义，都有固有和临时两种因素。这等因素平常都只凭着经验来分析。经验不同，分析也就不能符合……（至于）意义，更是这样。意义的体会常随经验而不同。常因经验不同而各人的联想感想不能互相一致。例如说白马，我此刻想起了唐僧的白马，你也许想起了白马将军的白马，另一些人或许又想起了上海跑马厅的白马。而对于白马的情趣和价值，也就各人的感想不能全同。对于含情的字眼，更是如此。”^[13]其中意义的固有因素，应该说与反映事物决定性特有属性的“深刻概念”相关，而意义的临时因素，和偶有属性相关。语言符号的固有因素与临时因素，在修辞创造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深入探究。

上述分析体现了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性与认知经验的个体性之间的深层矛盾；这种矛盾也是导致修辞困境的重要原因，无论对于修辞创造还是对于修辞理解来说，这种矛盾都不能不审慎对待。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性与认知经验的个体性之间的矛盾，往往还是时代价值观念与民族地域文化的差异造成的。这些差异在修辞创造中均具有重要意义，巧妙地加以应用，有助于突破修辞困境创造独特的修辞效果。我们将另文再作分析。

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索绪尔说：“语言处在大众之中，同时又处在时间之中，谁也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另一方面，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理论上又使人们在声音材料和观念之间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5]据此可以认为，尽管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性与认知经验的个体性之间的差异会给修辞创造形成巨大困境，但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给人们所提供的“在声音材料和观念之间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又能为言说主体实现修辞创造提供无尽的可能性。“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14]，亦是此之谓也。

三、突破修辞困境的路径选择

（一）修辞活动的复杂性

欲突破修辞困境，还需进一步认识修辞活动的复杂性。就本质而言，修辞是以语言要素及其应用规则为根本的科学与艺术，导致修辞创造面临巨大困境的直接原因在于：作为修辞学研究对象的修辞活动本身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而可资用以展现这种复杂动态过程的修辞手段或方式，既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又具有更加无限的可能性，因为尽管语言系统中的语言要素及其应用规则属于有限多数，但是它们可以被递归套迭而无限应用，还可以被创造性地截搭、压制以获得独特的修辞效果。正如俗语所言，一句话百样说，修辞手段或方式的无限多样性，无需多论。寻求最适切的修辞手段以最完美地传情达意，恐怕是无法彻底实现而只能无限趋近理想状态的任务；前述三种难以真正彻底解决的矛盾，也能证明这一点。

修辞活动的复杂性，也是造成修辞困境的重要因素。至于修辞活动的复杂性，不妨借用陈望道的深刻论述加以阐明：“语辞的形成，凡是略成片段的，无论笔墨或唇舌，大约都须经过三个阶段：一、收集材料；二、剪裁配置；三、写说发表。这三个阶段的工作都依赖于社会实践，并受一定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影响。但某些条件并不完全一样：如收集材料最与生活经验及自然社会的知识有关系；剪裁配置最与见解、识力、逻辑、因明等等有关系；写说发表最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有关系。”^[15]由此可见，修辞活动涵摄甚广，关涉众多，绝不应局限于修辞学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所主张的那些范围，即种种以同义手段选择和辞格运用等为代表的后发性的调整与修饰。

修辞活动的复杂性还表现为：“写说本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写说者同读听者的社会生活上情意交流的现象。从头就以传达给读听者为目的，也以影响到读听者为任务的。对于读听者的理解，感受，乃至共鸣的可能性，从头就不能不顾到……对于夹在写说者和读听者中间尽着传达中介责任的语辞，自然不能不有相当的注意。看它的功能，能不能使人理解，能不能使人感受，乃至能不能使人共鸣？”^[15]可叹的是，《修辞学发凡》问世之后的修辞学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体现出如此宏阔而深邃的眼光，而是比较狭隘地拘泥于以材料搜集、归类与赏析为主的研究，致使修辞学研究裹足不前，难以切实有效地指导修辞创造实践。

（二）突破修辞困境的路径

欲突破修辞困境，首先需要修辞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如此方可获得更为有效的指导。突破修辞研究

层面的困境,有太多工作要做,绝非任何个人以一己之力所能完成,需要相关领域所有研究者共同努力。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后,汉语修辞学研究发展迅猛。下文仅拟在借鉴近年来所涌现的诸多重要成果的基础上,初步讨论有助于突破修辞困境的路径。

1. 改变学术理念,确立并完善更加适应于修辞学研究的学科范式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学术转向宏观动态研究、提倡学科交融、推行多元研究范式并举”^[16]的大背景下,汉语修辞学研究呈现日益蓬勃、不断创新的发展态势。其中尤其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修辞研究范式的探究与革新。刘大为认为:“严格地说(传统修辞学)尚未进入研究的阶段——甚至没有形成一种强烈的意识,希望将这些杂乱的材料置于统一的理论目光的审视之下,以及专属的研究方法的操作之中。然而不找到这样的理论和方法,修辞学的研究便举步维艰,永远盘桓在常识的视野之中。”^[17]基于这种反思,在《比喻、近喻与自喻》中,刘大为明确指出,修辞学需要建立自己的研究范式,并着眼于认知性辞格的语言本质(即“寻求不可能特征”),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了辞格的认知结构和语言结构,为之建立了解释性系统,并对人的创造潜能与创造力的发挥、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创造中的改变,展开雄辩的阐释,为修辞学研究范式的确立,提供了堪称典范的样本。祝克懿则在库恩的学科范式理论视野中,选取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作为对象文本,以“对话范式”“作者范式与读者范式”为切入点,解读对象文本蕴含的多样性意义,富有逻辑地挖掘出范式理论与互文性理论向度的同一性和系统思维,揭示了范式传承与创新关系体现的学科发展规律,尤其是成功地把互文性理论解释为一种文本范式理论,从语言学角度认定为语篇学范式理论,见证了文本解读通过文本范式转换所实现的重大意义^[18],有助于革新汉语文本研究。

进入21世纪后,以《当代修辞学》和“望道修辞学论坛”为核心的科学共同体主动顺应学术发展趋势,“在新的跨学科语境下,丰富与发展修辞学科的内涵,为推动修辞研究的繁荣,贡献其杰出的学术智慧与心力”,作为其代表集体亮相的是《多学科视野中的当代修辞学——“望道修辞学论坛”论文集萃》与《当代修辞学的多元阐释——“望道修辞学论坛”论文集萃(第二辑)》,其中约六十篇精辟之论,尽管主导论题、理论背景、分析模式等诸多方面均不相同,但均以创新发展修辞学为核心理念,从不同维度探讨修辞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学科范式与分析方法等;该集萃可谓“集(新世纪)修辞学研究新理论新方法之大成的探索集……在中西多元文化交融的语境中,正以‘语言运用’为先导,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生活”^[16],对于突破修辞建构困境、推动修辞研究创新,均具有重大意义。

改变研究理念,革新学科研究范式,对于更加系统而深入地挖掘修辞创造规律以帮助修辞创造主体突破修辞困境来说,影响巨大;但因学科范式关涉深广,如何实现研究范式的革新与完善,绝非单篇论文所能解决,在此暂先作为一个突破口与研究目标提出来。

2. 恪守语言本位、悉心通晓语言文字要素的表达可能性

作为现代修辞学开山与奠基之作的《修辞学发凡》,之所以能历久弥新,除了因为理论框架、范畴体系等诸多方面的首创之功外,恐怕也与其“完全换了以语言为本位”的根本观念密不可分。究其本质,修辞毕竟是语言的科学与艺术。

陈望道指出:“修辞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而实际,无论作文或说话,又无论华巧或质拙,总以‘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为极致”^[15]。若要趋近“意与言会,言随意遣”的极致境界,首先需要设法消解“意念的多维性与能指的线条性”之间的矛盾,而消解这个矛盾的前提,正如上文所述,要尽可能明晰地将浑沌复杂的意念情思和并不更为固定的音响形象关联起来,并力求实现某种近乎精妙的确定性,这需要修辞的建构者审慎分析、萃取作为音响形象表征的词语所具有的精妙幽微的语义,如此才有可能适情适境地应用之。比如,在汉语中,可以关涉、表征“动”这个认知意念的词语数量众多:

(6) 波动、浮动、摇动、转动、移动、挪动……

宽泛而言,这些词语都可以表达“移动”这个理性信息,但若深入分析的话,它们所蕴含的认知参照点^[19]、认知视角与运动的方向、方式、频率、速度、力度、幅度、轨迹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均值得审慎辨析,如果不在这种向度上慎重对待而轻忽随意地遣词造句,就容易导致各种问题,例示如下:

(7) 对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来说,经过这一整天的兴奋,晚上应当是很容易入睡的。比他小一

岁的妹妹伊娃睡在他旁边。当他在床垫上转身时,常习惯性地用手抓着床沿。(林语堂《唐人街》,唐强译)

笔者对约150位母语者做过调查,均表示上例中的“转身”使用不当,应改为“翻身”。究其差异,关键在于“翻身”和“转身”的认知参照点与运动方式不同,前者表示水平向度的身体转动,而后者表示垂直向度的身体转动,且二者的动作幅度存在差异。由于使用频率等因素的制约,二者已经负载了明确的搭配(collocation)义,并在汉语操持者的大脑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图景(或框架),如果不按规约组配,就会打破认知经验,这势必会给话语理解造成障碍,而如果非要理解并接受“在床垫上转身”这种组合,需要改变整个认知图景(或框架);如此处理,代价太大。同样的道理,“站在我前面的小王翻过身看了我一眼”之类的表达也是无法接受的。如果不如此审慎而精细地辨析词语,恐怕是难以妥帖地进行修辞创造的。

若想趋近“意与言会,言随意遣”的极致境界,不仅需要如此这般地辨明语义,还应系统而深入地辨析语言要素的语用规则。试以下例分析:

(8)原来是你呀,差点没把人家吓死!(引自《现代汉语词典(增订本)》)

按照词典的解释,上例中的“人家”用以自指言说者,在修辞效果上具有表示“亲热或俏皮”的意味。从能否有效指导语言学习的角度看,词典中的这种解释无疑是粗疏的。经辨析可知,“人家”用于自指,具有严格的语用规约,不仅有性别要求(通常限于女性如此应用),而且还有年龄限制,即并非所有年龄段的女性都适宜以此自指的,年龄偏小或偏大的女性恐怕都不宜随便用之自指。该词用以自指,甚至还有颜值要求,在调查讨论的过程中,十余名男生明确表示“长得丑的女生也不能用”,观点固然偏激,但可资为证。由此可见,“人家”用于自指,深受一系列语用规约的限制,绝不能随意使用;当然,为了追求特殊的修辞效果的时候,可以故意打破这些规约。顺此可以认为,对于诸如辞格等具有“句段”属性的语言形式要素,也应系统地研究其组构要素、组构方式、组构类型、语用条件、修辞效应等,唯有将这些方面的特点与规律描写解释清楚,修辞学研究才能更切实地指导修辞创造实践。限于篇幅,对此不再展开。

据上可言,若要真正突破修辞困境以趋近“意与言会,言随意遣”的极致境界,若要真正推动修辞学研究深入发展从而更为有效地指导修辞创造,恐怕必须恪守语言本位,充分加强基础性研究;否则,欲求弥合言意鸿沟以实现言意相会,近乎建大厦于流沙之上。若想切实解决此类基础性问题,还有必要坚持“关系决定价值”这一理论原则,这是索绪尔语言思想的精髓。陈平称之为“系统中的对立”,他以此为利器,通过对“词、搭配和语法结构”等三种语言单位层级具体现象的分析,认为“语言成分在系统中的相互关联和对立关系,是决定语言成分价值的本质要素,这个思想,既是结构主义为基础的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核心,也是语言分析方法的核心”^[20]。这种思想与方法,对推进修辞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对梳理修辞规律,均有指导意义。

《修辞学发凡》指出:“修辞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所谓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一半便是这些种语言的习性。另一半是体裁形式的遗产。”^[15]上文所述的“能指的线条性与句段的非线性之间的矛盾、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性与认知经验的个体性之间的矛盾”,和语言的习性与体裁形式的遗产之间,关系甚密,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讨论。综合上文例(6)至例(8)的分析,可以说,修辞学研究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修辞创造还有太多的基础性问题需要探索。另外,若要真正突破修辞困境,还需尽可能全面深入地洞悉修辞创造的题旨与情境,这更加依赖修辞主体的“才、气、学、识”等多方面素养,其间更有无数领域值得开展系列探究。

四、结语

修辞是人类极为重要的基本行为,如何才能更加准确、精妙地表情达意,是千古以来所有言说者都无比困惑的问题,也是古今中外历代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黽勉探究的问题,所有言说者都渴望获得可以突破修辞困境的门径与方法,渴望能“精乎艺而臻于道”,从而更精当地实现内在意念情思的言语化。意念情思的言语化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过程,关涉诸多因素,面临重重困境,关键在于修辞创造所要实现的言语化的过程难以彻底客体化,因而难以全面系统地进行理性研究。本文借鉴理论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与

逻辑学的相关理论,经过深入分析,发现导致修辞困境的主要矛盾有三:意念的多维性与能指的线条性之间的矛盾,能指的线条性与句段的非线性之间的矛盾,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性与认知经验的个体性之间的矛盾。只有切实深入地认识此类矛盾,才能进一步系统总结修辞行为所包含的诸多规律,进而才能实现对修辞困境的突破。在深入研修《修辞学发凡》等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还对以《当代修辞学》和“望道修辞学论坛”为核心的科学共同性的诸多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并结合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提出:更新研究理念并发展完善学科范式、恪守语言本位并加强基础性研究从而通晓语言文字的表达可能性,应是推动修辞学不断创新发展进而更有效地指导修辞创新、突破修辞困境的必经之径。

参考文献:

- [1]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92-193,193.
- [2]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32,4,32-34,4.
-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106.
- [4]陈望道.文法简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5.
- [5]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22-125,157,106,157-158,170-171,18,244-256,179-181,171,102-103,104,104,113-114.
- [6]刘勰.文心雕龙[M].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95:359-360.
-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6.
- [8]熊子瑜,林茂灿.“啊”的韵律特征及其话语交际功能[J].当代语言学,2004(2):116-127.
- [9]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53.
- [10]陈保亚.当代语言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4-31,14-15.
- [11]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汉斯-尤格·施密特.认知语言学导论[M].彭利贞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44-256.
- [12]金岳霖.形式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4-22,18.
- [13]陈望道.陈望道学术著作五种·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38.
- [14]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113.
- [15]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5-6,6,3,20-21.
- [16]祝克懿.“众声喧哗”:当代修辞学畅响的乐彩华章(代序)[M]//多学科视野中的当代修辞学——“望道修辞学论坛”论文集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1-5.
- [17]刘大为.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
- [18]祝克懿.文本解读范式探析[J].当代修辞学,2014(5):1-17.
- [19]Rosch,E.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s[J].Cognitive Psychology,1975.7:532-547.
- [20]陈平.系统中的对立——谈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基础[J].当代修辞学,2015(2):1-11.

An Analysis of Rhetorical Dilemmas and Their Solutions

YANG Bin

Abstract: Rhetorical 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sic actions of mankind, which is in fact the verbalization of internal thoughts and emotions. The procedure of verbalization is very complicated, mainly because this procedure is completely difficult to be objectified.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multi-dimensional internal thoughts and one-dimensional linear signifier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one-dimensional linear signifiers and non-linear syntagmes, as well a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onventional lansigns and personalized cognitive experience, are the three main kinds of contradictions which would give rise to rhetorical dilemmas, according to linguistic and logical theories.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which can develop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rhetorics, so as to effectively instruct the rhetorical innovations. One is to innovate the discipline paradigm, the other is to recognize all the possibility of the values and oppositions of lansigns within the language system.

Key words: rhetorical dilemma; three main contradictions; discipline paradigm; approach; rhetorical innovation

(责任编辑:文建)